

禹城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
政协会议
禹城县委员会
办公室编

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

作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

的社会主义服务

李新

八七
十二

目 录

我的革命生涯.....龙光成（1）

战斗的一生

——缅怀屠凤林烈士.....[杨传文]搜集整理（37）

抗日将领——孙长胜.....王俊华搜集整理（42）

风云迭起 星火烈焰

——记禹城城内第一高等小学的革命活动

.....戴洪渐搜集整理（51）

渤海二中史略.....禹城一中校志组（66）

忆渤海二中.....贾兰田忆述
李 伟整理（76）

禹城文物古迹拾零.....肖德顺整理（84）

禹城姓氏历代演徙探讨.....王新三搜集整理（97）

禹城地方戏曲简介.....肖德顺搜集整理（115）

记禹城的民间文艺活动.....肖德顺搜集整理（130）

记重庆堂药店.....柴杰三忆述
韩继贤执笔（146）

燕子李三记实.....戚振奎
谢宝生搜集整理（155）

附录：

征集文史资料提纲.....（177）

我的革命生涯

龙 光 成 记述

县政协办公室 整理

(一)

我原名秦积明，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改名龙光成，沿用至今。山东省禹城县秦家老庄小桥街（现称禹城车站胜利街四十八号）人氏。一九一四年生人。祖父秦永职，务农。父亲秦嘉田，先务农后改经商。除自住宅一处外，另有街宅三处：自营货栈一处；合伙粮炭店一处；下设分店一处。父亲自任货栈经理，逐步由礼下于人的农民变为长袍马褂的绅士。

我自八岁读私塾。老师是名学究，善书法，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毛笔字。后改上学堂，十六岁时因军阀混战辍学，前后念书八年有余。辍学后在一家粮炭栈学徒，开始进入社会，接触社会。我爱阅读书报杂志小说，随着知识的增长和往来客商的说长道短，看到南北各地军阀为一己之利，争夺地盘，置

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，互相混战，朝连横而暮合纵。禹城车站地处济南近郊，交通发达，系鲁西北重镇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民房店铺常为兵营，五天以上战斗有五、六次之多，百姓外逃，店铺抢劫一空。真是无兵不匪，所到之处，横征暴敛，抓夫抢粮，扰得民无宁日，国势衰微，每每抚几兴叹，不知所为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大片国土沦陷，难民南逃，学生们离乡背井南下请愿，沿途高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慷慨激昂之情令人泪下。而国民党政府却持消极态度，坐等所谓“国际联盟”的调停，不顾民众的抗日要求，对请愿学生实行镇压驱逐。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爆发，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抗战，而蒋介石却下令中国军队撤离淞沪，与日寇签订了停战协定。之后，又在天津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何梅协定”，容忍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自治政府，成立伪“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”，迫走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。日本浪人肆无忌惮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到中国警察的枪上擦火柴，气焰之嚣张，令人发指。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学生救亡运动

遍及全国，蒋介石再次残酷镇压，勒令学校停课，遣送学生回家。我四弟积贵在济南高中上学，被韩复矩手枪旅押送回家，还叫家长签字，不许外出，等待复课。国民党政府的诸多倒行逆施，一副甘当亡国奴的嘴脸，激起全国军民的无比义愤，终于爆发了“西安事变”。蒋介石虽被迫停止内战，表面上接受了抗日八项主张，实际上还是在实行不抵抗主义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制造芦沟桥事件，尽管有宋哲元、董麟阁将军的奋起抵抗，无奈得不到南京政府的增援，致令中国军队节节败退。平、津、华北一带相继陷于日寇之手，並沿津浦铁路线南下，侵我华东。八月十天左右日机在我禹城车站掷下第一枚炸弹。顿时人心惶惶，商店纷纷闭门歇业，政府南迁，有钱人家收拾行李包裹准备逃难。其时津浦线北路交通已经阻断，南路火车到禹城就返回，车少人多，火车站已混乱不堪。八月底的一天，上午十二点左右，正当难民拥挤上车之际，两架日机对准车站俯冲轰炸。车厢四裂，人肉横飞，肠挂车顶，号哭连天。十几分钟内百人死伤，惨不

忍睹，（抗战时任禹城县长的谭锡三同志当时是学生，也在这次轰炸中受伤）车站附近的陈家客栈，二十余间房屋，主客几十条人命，顷刻之间化为灰烬。车站原驻有孙桐萱（韩复矩的师长）的一营兵，平时装模做样吓唬百姓，耍尽了威风。鬼子飞机一炸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连招募新兵的旗子也不见了。这个营的营长住在义隆货栈，这时也慌了手脚，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张庄车站，又返回来。说什么“张庄车站连人都没有了，还不如禹城方便”。晚上，抢了主人的线衣，揭了主人被子、床单，爬上铁甲车南逃了。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长官只顾逃命，丢下死难百姓谁来过问？还是老百姓自己。车站周围没遭难的百姓自动组织了抢救队，将受伤的群众送到南营镇治疗。

韩复矩的兵跑光了，又来了中央军刘多荃部。这伙兵着新绿军装，配有高射炮、高射机枪，大小口径炮，在城里和车站一带驻扎。老百姓心里又有点希望：单看这么好的武器装备，鬼子兵来了准碰个头破血流不可。谁知他们不挖工事不设防，只是要粮要物，到村子里翻箱倒柜抢东西，搞了个十室

九空。

这时，我和王风林还留在义隆货栈看家。一天早上七点左右，突然进院几十名佩冲锋枪的士兵，把我们堵在房里不准外出。一位挂少将衔的军官对我俩说：他是参谋马介候，一会儿三战区司令长官冯副委员长来此休息，有话要问。不久，冯副委员长派人把我叫去，询问徒骇河有多深多宽，我一一做了回答。又要我领他到河岸上亲自看看，在河岸上又问了很多问题。这时来了几个中将、少将军官，据说其中就有刘多荃。看他们足蹬马靴，腰挂佩剑，指指点点，倒也威风，也可能真同东洋兵干一场，为老百姓出出气，只是为什么不在河涯上修筑工事呢，冯副委员长总不能白来一趟吧？我满腹狐疑地回到货栈。几天后，冯的铁甲车开走了，据说是中央军不听指挥，气走了，令人大失所望。

刘多荃部也南逃了，又来了中央工兵团，天天在徒骇河五孔铁桥上打炮眼，轰隆几声响，把铁桥炸落河底。尔后又在老百姓家里杀猪宰羊掏鸡窝，把老百姓赖以糊口的粮食打扫一尽溜走了。

这就是南京政府的军队，从此对南京政府抗战

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学子徒有报国志，空对明月兴长叹！

(二)

能等着当亡国奴吗？不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一定想法找救亡之道。我想起了同村族兄秦积和（后来化名朱儒）。他是我童年时同学，在城里高小上学时参加了共产党。官家捉过他，迫使他离开禹城多年。事变后回来了，现住朱家道口。我去找他问问有无出路。借春节拜年之机，和他谈起抗战的形势，不愿当亡国奴的心情，求他指点一条打鬼子的道路。他说如今国共合作一致对外，抗日打鬼子的事好办，联系联系再给我回音。听了他的话就象多日阴霾见到了阳光，我说“只要能打鬼子，干啥都行”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日寇兵不刃血垂手占领禹城。三八年春伪政权成立，勒令外逃难民回籍，否则没收房产。日伪的统治很严，尤其对青年总怀疑是中国士兵，经常查东问西。上街出门，要带“良民证”，弄不好就被带到宪兵队里去了。积和（朱

儒)家居农村,进城不方便,我就同邻舍族弟秦积智去他家见面,知道他已有所联系。听他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抗日活动的消息,心中豁然开朗,认识了一个真理: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。三八年十一月在冯庄由秦积和(朱儒)、聂修齐两人介绍,我和秦积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不久,经上级批准,组织起禹城第一区区委,朱儒同志任区委书记,聂修齐同志任组织委员,我任宣传委员。又在车站成立了区委领导下的第一个党支部,朱儒同志任支部书记,我任组织委员兼统战委员,积智同志任宣传委员。自此,车站有了党的组织,在县委区委的领导下,深入敌人心脏地区,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朱儒同志的公开身份为小学教员,我是货栈的店员,积智同志则装成老实巴交的农民,以此掩护进行工作。从三九年至四四年,农村支部党员发展到十名,工人支部(搬运工、铁路工人、邮电工人)发展到十三人,店员支部(货店、棉花行店员)发展到十三人。四〇年县委与区委合并组成铁路工委,朱儒同志参加工委工

作，四二年调韩家寨完小任教。同时，车站支部改为中心支部，我任书记，王林祥同志任组织委员，积智同志还是任宣传委员。四〇年夏，积智同志调走，由秦积水同志继任宣传委员。积智同志于四一年殉难。

(三)

在狡猾凶残的敌人心脏里活动，必须机智善斗，不为其表面强大所威慑，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统战关系隐蔽好自己，才能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。

四一年朱儒同志去学习，我代理了几个月的教员。小学的位置正在村头上。那时日寇把车站划为“爱护村”，要求必须挂一块学习日语（注上汉语拼音的日文）的小黑板于村头，正好挂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。这块小黑板由宣抚班的鬼子翻译每周换一次。鬼子翻译的来来去去，影响我们的活动，乘一个风雨天我们把小黑板摘下来扔进水塘里去。第二天，翻译来查问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煞有介事地告诉他是风刮走的。连续折腾了几次，鬼子翻译烦

了，要把小黑板交给我管。我说我不识日文，几十个学生的课忙得我没工夫，管不过来，拒不接受。他把村长找来了，我对村长说：“实在没这种本事，我干不了，你另找教员吧。”村长怕我辞职，就答应由他自己管。有人管，翻译也就放心不来转了，而小黑板也就渐渐不见了。

四〇年后，日寇渐渐感到共产党八路军对他们的强大威胁力，决定在禹城建立营房，常驻一个步兵联队（相当于一个步兵团），把宣抚班换成宪兵队，设立兵站部。禹城从此成为日寇往聊城、惠民四出扫荡的基地。形势的变化，党对禹城车站的情报需要就更加迫切了。经支部讨论认为：情报愈重要，愈频繁，愈要安全隐蔽，决定将情报内容由口传、钢笔书写改为用小字毛笔沾化学药水写在白纸或烟卷盒的锡纸背面，干后不见痕迹，用煤油灯一烤就显出褐色字句。书写工作由我负责，由交通员秦积良同志送出。

四〇年春，日寇集中了济南、德州和四个县的日军步、骑、炮兵万余人，从禹城车站出发，进攻聊城范筑先将军的抗日部队。我们及时地搜集到上

述情报送到根据地。

四一年春，伪山东省长唐仰杜要“视察”鲁西北以粉饰“强化治安”。上级要求车站组织迅速搞清情况，以便阻击。我们通过铁路部门同志的努力，对照日伪人员透露的消息，得知唐仰杜到达禹城的准确时间是第三天早上六点，并随即乘坐日本军车往西“视察”。我们将这一情报提前两天送到根据地。事后得知：唐在高唐西受到我军阻击，绕南路窜回济南。

我们的活动使敌人感到背箭之疼，于是在车站宪兵队增加了特工人员，加强对青年人的监视。一天，我到站下柴福忠扒鸡铺买鸡，我走后女特务老蔡家指着我的背影对柴福忠说：“他和秦积和都是共产党。”柴福忠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人家一个是买卖人，一个是教员，都是秦老庄的老户，可不能编瞎话害人。”柴福忠还特意把这一情况告诉我叔。我叔回家问我，我当然不能承认。我对叔说：

“你让柴福忠给老蔡家说；中国人是有人性的；别帮着鬼子杀害中国人。”镇住了女特务老蔡家没敢向鬼子告密。

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支委会再一次作了讨论，进一步强调提高警惕，保全组织，把会议活动改为骨干碰头，加强敌情分析，并进行气节教育。万一被捕，要不惜牺牲个人生命，保护组织不遭破坏。

四一年，上级调我去冀南六地委党校学习，毕业后留地委秘书处工作。朱儒同志从铁路工委禹城车站的工作需要出发，又把我从地委要了回来。回车站后，根据上级指示的“隐蔽精干、积蓄力量”的精神，对车站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作了调整。马连义为工人支部书记；秦积水为农村支部书记；王林祥兼店员支部书记。

四二年春，边区党委副书记庞均（现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）和禹城县委书记赵毅由济南回鲁西区委，在济南上车时就被敌人发觉盯梢，到禹城虽趁下车混乱之机甩掉了“尾巴”，但危险仍然存在，必须立即离开。当时，往鲁西的民用汽车不通，只好在日本军车上想办法，朱儒同志要我去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以我父亲的名义去找日本宪兵队翻译于殿魁。于的叔父原是义胜粮栈经理，与我父亲相交。于来车站后又住我家的房子。我估计有这层关系于

殷魁不能不帮忙。我说：“有两个同学由济南回高唐家奔丧，必须今天赶到，求你给想想办法”。于殷魁沉吟了一阵子说：“这事不好办，不过，是你的同学我一定帮忙。非坐大兵车不行，拿大洋去试试看。”我和他来到西河桥口，朱儒他们三人已在那里等着了。一会，兵车来了，于招招手，过去讲了一阵日本话，我把五块“袁大头”当当响地往前一送，鬼子就笑了，“朋友大大的。”上车后在汽油桶空里一蹲，上面盖上蓬布，约定到高唐东关外以敲车顶为号下车。看着他们上了车我和朱儒的心就悬了起来，直到几天后回信安全到达，才松了口气。而车站这边，为了搜寻他俩的下落，特务宪兵一齐出动，搜客栈查户口折腾了两天，什么也没找着。

四三年，鬼子的末日已近，更加望风捕影地抓“共党嫌疑”。这年夏天，我禹城一区区委员李尚德同志，打扮成小商人上集，被特务以嫌疑犯拘留了。经刑讯，只承认是卖点心的小商人。特务们不管这些，把他押进车站警察分局，准备送到东北去当劳工（等于判无期，有去无回）。上级要我

们设法营救。恰好车站警察所伪所长王某住我家房子，我就要求父亲去找他（按上级指示：我不公开活动），说明李尚德确是小商人，一家人靠他养活，把他放出来算了。我父亲不知内情，他说：“这个姓李的同我家非亲非故，也不知是什么人，要受连累的。”还把我训了一顿，不许我管。于是，我就和同志们去商量，想出另外一条妙法。原来李尚德的岳母是个“一柱香”道徒，我妈也是，让她来找我妈认道友，走我妈这条关系救人。果然，两人一烧香，磕了头爬起来就亲热极了，再谈到救人，我妈就答应帮忙。李的岳母又领着李的老婆到我家，对着老头老太太又哭又磕头。老头没法了，只好答应找王所长说说看。我父亲松了口气，我就好周旋了。我与妈商议借个理把王所长的老婆请来吃饭，好酒好菜招待一番，酒醉饭饱才对她提出救人的事。她说：“大娘，我给所长说说，你等着听信吧！”我拿出二百元伪币递给她，说：“这事得花钱，就请所长辛苦吧！”过了两天，王所长自己来回话了：“老太太说的事，只拿二十张花纸（指伪币）不行，还得拿出这个数的银元来，”说着伸出

一个拳头来比量了一下。我只好又给了五十块袁大头。又过了两天，王说：“明天下午去东北的劳工车来拉人，冒冒险吧。”他做了个往外推的架式。届时，我在站外眺望，远远看见火车拉笛启动时，突然从闷罐车里向外滚出一个人来，顺着外站台滚到道基下边去了。那人爬了起来，朝西南方向跑去，也没人在后追赶，那人就是李尚德。后来知道是王惠民（即王所长）亲自上车把他推下来的。

四三年秋，我党齐河县七区王书记（齐河七区石碑杨庄人）在村外拾粪时，被“清剿队”抓了劳工，也是关在车站警察分局要往东北送。上级还是要我们设法营救。我向父亲露了露出面保王的事，他立即暴跳如雷地说：“上次李某人的事我还在嘀咕哩，又来了。这点家产、二十几口人的命都断送在你手里吗？你滚出去别回来才能安稳。”我想：你发作吧！反正还得从你身上打主意，不过是多绕个圈子罢了。我听老婆说过，她姨家在石碑杨庄，同王书记是一个庄，叫她姨家来人兴许有“门”。几天后，老婆的姨表兄杨恩远来了，先认了亲戚，接着谈保人的事。杨恩远对我父亲说：“我是受街